

# 也谈三代都城屡迁原因

刘 铮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三代都城屡迁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论及其原因，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事实上，三代都城屡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人口作为社会的主体，也无疑在三代迁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此，本文着重从人口的角度来分析三代都城的屡迁。

关键词：三代；迁都；人口

中图分类号：K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10)01-0039-04

都城屡迁，在三代似成一种通例：夏朝十四迁而有十二都，商朝若从先公算起则有前八后五之说，西周五迁而有六都。至于其屡迁原因，自古以来就争讼不已，说法不一。

丁山认为，“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之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迁徙，部落之领袖因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国家可言”<sup>〔1〕</sup>。这种说法否定了三代国家的存在，忽视了三代皆以农立国，显然与事实不符。

傅筑夫认为三代迁都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sup>〔2〕</sup>。该“游农说”虽然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但不免又落入丁山“游牧说”之窠臼。

黎虎认为殷都屡迁是“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之乱”所引起王室与贵族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殷王常借迁都以重整王室力量<sup>〔3〕</sup>。

邹衡则说“盘庚迁殷……就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sup>〔4〕</sup>。

齐思和也说周自西东迁亦出于与殷商争夺政权的动机<sup>〔5〕</sup>。

张光直先生则提出一个新颖别致的观点：“俗都屡变，则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的因素”，“因为没有铜锡矿，三代朝廷就没有青铜器”，“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sup>〔6〕</sup>。

此外，还有“水患说”、“去奢行俭说”、

“政治斗争说”等。

上述观点或引经据典，或大胆设想，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生存环境等不同角度对三代都城屡迁原因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人口却被忽略，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由此，本文着重从人口的角度来分析三代都城的屡迁。

事实上，人口因素对迁都的影响早就有述。《尚书》盘庚篇中记述了盘庚迁殷时对众人的训词：

“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呜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鲜以不孚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匱。……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训词不仅透露出“不常厥邑”乃古之遗风，而且明确说明了迁都的原因是“民利用匱”。盘庚以此作为迁都的原因，无非是“民利用匱”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人口的增殖。《尚书》为春秋时孔子所编，《盘庚》无论是时人所记还是后人所录，去古未远，当为可信。

由于史料的缺乏，三代人口的确切数目，我们已无从得知。但我们运用科学的方法，并结合相关信息，则可以做出大致的估计和推算。

宋镇豪根据人口学相关理论并结合考古学资料，推测出这样一个结果：夏初“万国”总人口

大体在240万—270万之间。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总数也应在400—500万人之间,比夏初约净增了48.15-87.5%。他还推算出,偃师二里头夏代后期王邑人口为3.1万,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邑为5.5万人口,郑州商代前期王邑为8万人口,商代后期殷墟王邑为14.6万人口<sup>[7]</sup>。王育民在其《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一书中,按照0.75‰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推测出:夏初人口有135万,商初人口为196万,西周初有285万。以上推测结果虽然仍大有商榷之处,但也能大致反映出三代人口的基本特征:人口非常稀少而且多集中于都邑,尤其是王都;增长比较缓慢;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上古时代人口数量的增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具有战斗力和劳动能力的人口规模,对当时的国家、方国和基层组织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往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sup>[8]</sup>。人口得失是决定国力强盛和社会财富规模的一个重要标志。“无人则土不守”,“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福”<sup>[9]</sup>,人口不仅是军队的来源,也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减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sup>[10]</sup>为增加人口,梁惠王可谓是殚精竭力、用心良苦。“余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sup>[11]</sup>。李悝变法的目的之一也是增殖人口,至少也不要国民因离散而使人口减少。越王勾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把增殖人口作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主要内容,并以“庙礼”待“四方之士”。春秋战国时的统治者对增殖人口尚且如此处心积虑,三代之时更不待言。

三代诸王也深谙“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sup>[12]</sup>的道理,他们渴望人口的增加,也不遗余力地尽一切办法去增加人口。首先是鼓励生育。武丁几次为其妻妇好分娩而占卜的记录;刻有“多子孙甲”的卜辞;周时“促婚配”之官“媒氏”的设立,以保优生优育的“同姓不婚”制度的确立等都是这一措施的反映。其次是“关心”庶民。“众”或“众人”是殷的本土居民,也是商王所直接依靠的最基本的力量,无论种田、当

兵、戍守以及其他劳役都是由其负担。殷王对他们也格外关照。盘庚在迁都前对“众人”的训话虽也有威胁之词,但更多的是利诱之语,恳切有加,溢于言表。“贞,众有灾”(《前5.45.4》),“众……灾,一月”(《京津》1926)等占卜“众”是否有灾祸发生的卜辞,就是奴隶主贵族对“众”“关怀”的体现。再次是招徕人口。诸王一方面经常迫使所属方国和侯国供纳人口。“翌庚寅今入戈人”(《合集》8393),“登奠臣”(《合集》635反面),“取徒”(《合集》839),“取射”(《合集》5756)等卜辞就是“戈”,“奠”等国以赋的形式向王室缴纳人口的记载;另一方面大肆掠夺敌对方国人口,卜辞中有多次“获羌”、“获奚”的记录。俘来的人口或作奴隶从事劳动或作为人祭以祭祀神灵,既补充了本土劳力的不足,又可有效地消耗敌国的有生力量。最后是对人口进行严格控制。一方面禁止逃亡,武丁曾为抓捕逃亡者而兴师动众,周文王则以“有亡荒阅”为得天下之大法。另一方面确立户籍管理制度和进行人口普查,据《周礼·地官》记载,当时无论在都邑还是郊野,从上至下都设有管理居民的组织;周初还设“司民”之官,“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以资王治”;周宣王丧“南国之师”后曾“料民于太原”<sup>[13]</sup>。

“随着人们治理和改造自然环境能力的加强,以及已开发地带的有限地域空间越来越难以承受人口持续增殖的压力,居住地仍维持在局促的地理范围内,就逐渐变得不太现实。”<sup>[7]</sup>“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sup>[14]</sup>。人口的增多,也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口增多不仅会使人均耕地相对减少,进而引起粮食供应的不足;而且会使本来就局促的城郭变得更加狭小,从而造成住房的紧张。

三代都邑多遵循“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经营模式。王都的营建更是非同寻常,据《诗经·大雅·绵》所述,筑城之前就需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观察地形、占卜、通过实地测量确定筑城的具体方位、设计筑城规划图、确定筑城方案;而后集中物力财力,征调人力开始营建。出于防卫的需要,都城在营建之时,往往就高筑城墙或深掘壕沟。这样以来,都城的大小便基本上固定

下来,因而不利于大规模的扩建。由于都城人口的自身繁殖,加之都城乃辐辏之地,来往者甚繁,都城便会变得日益狭小。武王都镐,就是出于“四方来朝着丰不足以容之”<sup>[15]</sup>这方面的考虑。

安阳的殷都却有着不同的规划。殷墟的范围很大,分布于洹河两岸,包括了小屯、后岗、苗圃等二十余个村庄,总面积达到24平方公里;这还仅是考古发掘的范围,至于当时实际所占面积,应该更广一些。然而在历经数次考古发掘后,人们发现除在宫殿区西南200米处有一条宽7~21米、深5~10米的防护宫城的人工大壕沟外,竟没有城墙的遗迹;也即是说,殷墟曾是一个开放式的都城,是有城而无墙的。这显然有违于常规,与筑城的目的有悖;其实,这不难理解,筑城而无墙,不仅省筑墙之劳、拆迁之费,而且在需要时可以任意扩建。盘庚在迁都前对众人的训词中就明确说明了迁都的目的是“永地于新邑”。这一做法则极好地实现了这一目的,因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若没有毁灭性的因素,旧都不是废弃不用,而是长期存在。这样的实例很多。据说是禹都阳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其文化堆积显示,自龙山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武丁征“人方”之始,还先到商丘故都去行“告庙”之礼。陕西宝鸡出土的微史家族遗物《史墙盘》也表明,岐周之都一直到西周灭亡才沦为废墟。“周人虽然迁都镐京,但丰京从未废弃”<sup>[16]</sup>。在西周的二百多年中,周王等奴隶主贵族曾多次到此朝拜祭祀、处理政务。新旧都这种并存关系表明迁都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分流人口,缓解人口压力。

发展农业也是缓解人口压力的好办法。“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干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sup>[17]</sup>三代都城所迁之地多位于河流附近,而且地势平坦、广阔。靠近水源,便于城市用水和农业灌溉;地势平坦,利于垦田耕种。由于三代农业的极端重要性,是否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口增值便理所当然地成为诸王选择迁都之所的首要标准。

在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卜雨,卜“受年”的卜辞,如:“甲子卜,来岁受年,来岁不其受年。”(《簠室殷契徵文》卷九)“己酉卜,黍

年,有足雨。”(《前》4.40.1)“帝令雨足年,贞,帝令雨弗其足年。”(《前》50.1)在这里,“年”指粮食的收成。可见,祈求时雨和丰收是王室乃至商王所关注的大事。夏禹之时曾“尽力乎沟洫”。西周时还专门设立了掌管农事的官员,如小司徒、载师、司稼、稻人、草人、遂人、场人、廩人、仓人等。三代诸王对农业生产情况的关注如此密切,不仅说明了由于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耕地面积的狭小而使农业的发展变得异常艰难,而且多少透露出人口增多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沉重压力。

三代皆以农立国。农业是三代的经济基础,农业收入是三代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sup>[18]</sup>土地,尤其是耕地,不仅是发展农业的场所,而且是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而三代的耕地状况却是不容乐观的。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天下土地归王所有的一种土地私有制。实际上,三代诸王对土地的控制是极其有限的。就是在三代的势力范围内,诸王也不能进行有效控制。一方面,势力范围也被分成很多块,“有的地区由诸侯直接管辖,有的地区由功臣、贵族直接管辖,有的地区则有由王室直接管辖”<sup>[17]</sup>。另一方面,在直辖区既有同姓诸侯也有异性诸侯,异性诸侯势必潜伏着一定的离心力量。此外,由于地广人稀,诸侯都邑是呈点状分布的,都邑之间往往形成众多“隙地”。春秋中期的宋国和郑国之间尚有弥作、顷丘、玉畅、岳戈、锡6处归属未定的未开垦之地,年代稍早的三代之时这样的“隙地”则更为普遍。武王伐纣时所看到的殷代社会,是一片“麋鹿在牧,蜚鸿遍野”的景象;“周公相成王,诛纣伐奄”时,竟至“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周宣王时,郑土多草莱,郑桓公不得不“斩之蓬、蒿、藜、藿”,以事开拓。加之三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尚不具备在远离水源、不宜农作的地区耕作之手段和远距离耕种的条件,三代诸王的有效控制区便只能被局限在王都的周围,即“王畿”之地。

与之相应,三代的垦田也主要集中在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即所谓“国中”,比较好的“熟田”大多集中在这里。王



都及其周围的垦田就是王和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田”或“大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sup>同[8]</sup>，“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sup>同[8]</sup>，为了招徕人口、满足都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土地的需求，统治者都极力垦田。“令尹作大田”（《丙》71），“勿令尹作大田”（《丙》71），“我作邑”，“王作邑”，“作邑于某地”等卜辞就是商王为自己开辟直属田邑的记录。

三代王室不仅直接控制的土地相对较少，而且对方国或诸侯国的控制也是很弱的。夏商时，中央政权和诸方国是地位近似平等的结盟关系，夏王或商王仅是天下的盟主而已。夏时东夷部落的后羿轻而易举地夺取夏政，少康又以“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sup>[18]</sup>，可见王室与方国力量相比当在伯仲之间。早商成汤时，“诸侯毕服”；后来伊尹摄政，“以朝诸侯”；太甲时，“诸侯咸归殷”；雍己时，“诸侯或不至”；太戊时，“诸侯归之”；自仲丁至阳甲，“诸侯莫朝”；盘庚时，“诸侯来朝”。王室势力的消长对方国的态度有着这样深刻的影响，当王室强盛，方国归附；当王室衰微，方国多叛，有时则直接威胁着王室的存亡。

西周时封邦建国，以藩屏周，周王为天下之共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sup>[19]</sup>。事实上，周王对诸侯国和周边方国的控制是相当弱的，远没有达到秦汉大一统的程度。诸侯国不仅拥有军队、而且财赋自专，隐藏着很大的离心力量，周边方国也时服时叛，多畔王命。先是“三监”之乱，后有“昭王南征而不复”，又有穆王西伐无功而导致“自是荒服者不至”。周夷王时更是亲自下堂接见来朝的诸侯，王室式微，可见一斑。王的直辖区之各项赋税是王室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而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之丰歉则关系着王室的生死存亡。至于方国或诸侯国的贡品仅是王室财政收入中微不足道、少的可怜的一部分。王室力量与势力强大的方国或诸侯国相比若不是占绝对优势，王室便时刻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王室力量的衰微，彰显出诸侯和方国力量的增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sup>同[8]</sup>唯有人口才是增强王室经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因素。

不难看出，人口对三代社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三代统治者对人口增长的渴望和人口

增多所带来的种种压力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通过迁都的办法来获得解决。迁都不仅有利于分流人口，缓解人口增多带来的压力；也有利于扩大王畿，开垦荒地，增加王室控制的耕地面积，进而增加王室的财政收入；还有利于震慑周围方国和畿内诸侯，从而有效地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迁都的意义如此之大，诸王自然乐此不疲。

当然，人口是三代都城屡迁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三代迁都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不仅历次迁都原因不尽相同，而且每次迁都都有着多种因素；在诸多因素中，既有主导因素，又有次要因素。如相居“帝邱”、又居“斟藩”的主要原因是后羿所迫，武王迁都镐京主要是因为丰都的狭小，平王东迁洛邑则主要是“鉴于镐京残破”。对此我们应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不能以偏盖全、一概而论而忽视其差异。

#### 注释：

[1] 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辑（1935）。

[2] 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

[3] 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4]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5] 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30期，1946年。

[6]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三联书店1990年5月。

[7]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

[8]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6月。

[9]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2月。

[10] [战国]孟轲：《孟子》，广州出版社2001年5月。

[11] [东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6月。

[12] 王文锦：《礼记译解》，中华书局2001年9月。

[13] 刘向：《国语》卷一“周语上”丛书集成新编(109).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14] [战国]商鞅：《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

[14] [战国]商鞅：《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

[15] 王应麟：《诗地理考》卷四“镐京”丛书集成新编(91).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16] 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

[17] 孙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

[18] [战国]左丘明：《春秋左传》，九州出版社2001年2月。

[19] 孔子：《论语》，万卷出版社2008年8月。